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 贵州各族农民起义论文集

第 一 集

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

一九七九年五月

说 明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在多民族杂居的贵州山区，爆发了全省规模的各族农民大起义。贵州各族农民团结战斗，极大地支援了太平天国的革命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这次大起义是太平天国革命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过去，由于林彪、“四人帮”的严重干扰和破坏，贵州史学界对这次各族农民大起义的调查和研究中断了十余年，以致在中国通史和太平天国革命史中难以反映它的全貌。

粉碎“四人帮”后，科学的春天来到了贵州高原。贵州各族史学工作者又重新开展了对这次农民大起义的研究，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二日，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在贵阳召开太平天国时期贵州各族农民起义学术座谈会。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汉、苗、布依、侗、水、回等民族的史学工作者三十余人。大家一致认为，认真总结太平天国时期贵州各族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有利于发展历史科学，有利于祖国“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这次学术座谈会前后，同志们就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贵州各族农民起义的若干问题分别撰写了专题文章。现将部分文章汇编成第一集，以后再编印第二集。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时间仓促，这个集子还存在不少问题，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贵州省民族研究所

一九七九年四月

目 录

说明

研究农民战争史的光辉典范

——《德国农民战争》学习札记	康健文 ()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的贵州各族农民大起义	
.....侯哲安 翁家烈 杨有耕	()
贵州各族农民起义与太平天国革命的关系	王正贤 ()
贵州号军起义	周春元 ()
贵州各族农民大起义的揭幕人	
——杨元保领导独山布依族农民起义	黄才贵 ()
杨凤、舒裁缝领导的黔北农民起义	何长凤 ()
张秀眉等领导的贵州苗族农民起义	吴廷栋 ()
潘新简领导的荔波水族农民起义	张永国 ()
贵定苗族农民起义	张英志 蒋国维 ()
姜映芳领导的侗族农民起义	廖耀南 ()
岩大五领导的苗族农民起义	贺国鉴 ()
陶新春领导的黔西北苗族农民起义	贺国鉴 ()
张凌翔、马河图、金万照领导的回族农民起义	保健行 ()
有关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贵州各族农民起义的国外论著简介	
.....王慧琴	()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贵州各族农民起义参考书目	周 鼎 ()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贵州各族农民起义军部份文物目录	贵州省博物馆 ()

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

研究农民战争史的光辉典范

——《德国农民战争》学习札记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康建文

内 容 提 要

本文是作者在参加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贵州农民起义讨论会时学习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的札记。

尽管太平天国革命和十六世纪初叶爆发的德国农民战争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它们却是性质不同的革命：太平天国革命仍属于旧式的农民战争，而德国农民战争已“不仅是农民的反抗，而且还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这是由不同的国情所决定的，归根结底是由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不同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因此，我们不能生搬硬套恩格斯对德国农民战争的某些结论，而主要是学习恩格斯研究农民战争史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提高我们对太平天国革命的研究水平。这也即是作者大胆地把本文提供给讨论会的原因。

全文共分五节。第一、二节简要介绍了德国农民战争及其领袖人物托马斯·闵采尔的概况和恩格斯的评价；重点在第三、四节分析、探讨了《德国农民战争》这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经典著作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恩格斯的研究方法，本文作者的学习心得和观点则贯串全文各节，最后在第五节得出恩格斯曾指出过的下述结论：

历史上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的变更中寻找，不应当在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寻找，而应当在有关时代的经济学中寻找。

研究农民战争史的光辉典范

——《德国农民战争》学习札记

康建文

正当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即将震撼满清政府的根基，而贵州各族农民的大起义方兴未艾的时候，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在伦敦写出了一部研究农民战争史的伟大著作——《德国农民战争》。他在这部著作里，介绍了十六世纪中叶横扫德意志大地的一场农民战争的风暴；并指出这场风暴“如果是在一个中央集权化了的国家，说不定会创造出多么伟大的成果”。①（下文中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引自《德国农民战争》。）

在封建的中央集权的古老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和持续之久，是举世罕见的。特别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太平天国革命，更取得了人类历史上农民战争所能取得的最伟大的成果：它席卷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成功地建立起历史上第一个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政权，并坚持了十多年之久，使满清政府从此一蹶不振。恩格斯认为农民战争是“整个德国历史的基础”，②毛泽东同志也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③因此，对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是历史科学的主要内容。

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是正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农民战争史的光辉典范。

解放以来，新中国的史学工作者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对中国农民战争史作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而，在林彪、“四人帮”肆虐的时候，历史科学却受到了一场空前的浩劫：他们在所谓“史学革命”的旗号下，残酷地迫害着正直的历史学家和坚持真理的广大史学工作者；从中国的古代史、近代史到现代史，他们都按照他们篡党夺权的需要进行了无耻的捏造；对世界史也进行了疯狂的践踏。实践证明，林彪、“四人帮”是历史科学最凶恶的敌人！

粉碎“四人帮”后，历史科学才又获得了新生。今天，在我们深入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的时候，学习革命导师研究农民战争史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以发展我们的历史科学，这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一、德国农民战争概况

十五世纪下半叶到十六世纪初叶，德意志民族经历着欧洲史上一个伟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国王的政权依靠市民打垮了封建贵族的权力，建立了巨大的、实质上以民族为基础的君主国，而现代的欧洲国家和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就在这种君主国里发展起来；当市民和贵族还在互相格斗时，德国农民战争却预言式地提示了未来的阶级斗争，因为德国农民战争不仅把起义的农民引上午台——这已经不是什么新的事情了，而且在农民之后，把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驱也引上了午台，他们手里拿着红旗，口里喊着财产公有的要求。”④这是一个激烈变革的时代。

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就爆发在这样的时代，它是指1524——1525年全德意志空前规模的以宗教改革发端的农民大起义。“这个伟大的德意志农民战争是革命的德意志农民和平民为消除封建主义和创立统一的德国而作的英勇的尝试。”⑤或如恩格斯所说：“……不仅是农民的反抗，而且还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

这次农民战争并不是在政治和宗教上一种毫无结果的热情的迸发，而是当时德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反映，是德国历史上一个带有关键性的转折点。全国规模的大起义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历史事件，在它爆发前数十年，“处于萌芽状态的革命精神的最初征象就在德国农民间显露出来了。”十五世纪下半期发生的一系列的地方起义，是德国农民战争的直接先驱。这些起义是用“吹鼓手汉斯”、“桂会”和“穷康拉德”等名义发动起来的，它们都被统治阶级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但农民革命运动却没有终止，起义的火焰继续燃烧着，德国沸腾起来了，终于在1524年以后爆发了空前规模的全德农民大起义。

农民战争的风暴席卷南、北德意志。起义的中心地区有三个：士瓦本、弗兰克尼亚和图林根。起义首先在士瓦本爆发。这儿的农民富于革命传统，而且当时贵族的兵力“几乎全部在意大利正与法国弗朗斯瓦一世作战”，统治力量十分薄弱，因此起义获得了成功并迅速蔓延到整个南德意志。到1525年三月初，士瓦本的六支农民起义军的总兵力已达数万人之多。在弗兰克尼亚，也有六个起义中心，建立了好几支农民军。一些低级贵族（骑士）参加了起义并担任了指挥官，城市市民也参加了起义，他们开城欢迎农民军，依靠农民的支持夺取了一些城市的统治权。在图林根地区，起义的中心是繆尔豪森市。起义领袖托马斯·闵采尔在这里亲自领导了运动，并在繆尔豪森市推翻了城市贵族议会，建立了一个称为“永久议会”的革命政权。这个政权进行了若干民主性的改革，组织了革命武装，号召全德起义。闵采尔实际指挥了“永久议会”的工作，他是“整个运动的牵线人”。

各支起义军的共同目标是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和取消封建剥削。然而，这场战争却没有一个所有起义者能共同遵守的统一纲领。开始时，各地的起义军各有自己的纲领，但这些纲领都只包括本地区农民的要求和控诉。以后，大部份起义军逐渐在妥协在一个较温和的纲领下，即有名的《十二条款》。这个条款并不在原则上反对现存制度，而只想进行一些或多或少的改良，幻想封建统治阶级会作一些让步。“由此可见在各农民军

中温和妥协派还大占优势。”这是导致农民战争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在起义军中，最激进的纲领是闵采尔派的《书简》，它的基本特点是彻底的反封建性，并坚决地主张暴力革命。“这项激烈的宣言（指《书简》）显然是在1525年春起义之前拟定的，它的主题就是革命，就是打倒现存统治阶级”。这是实现农民所要求的消灭世俗和教会贵族剥削压迫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是农民战争中最革命的纲领。可惜只有少数坚定的革命农民和平民进行着以《书简》为纲领的斗争，也就是说体现在《书简》中的闵采尔的思想还不能被他所处的时代完全接受。这也注定了这场农民战争不可避免地失败。

另外，除了《十二条款》和《书简》，还有一个恩格斯在书中未提到的重要纲领，这就是参加起义的市民阶级提出的《海尔布隆纲领》，又叫《帝国改革纲领》。⑥这个纲领要求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这个政权的基础是有低级贵族参加的市民和农民的巩固联盟。这个纲领规定有封建依附关系的农民可以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来获得自由，允许把没收的教会土地分给低级贵族作为他们共同行动的报酬，号召建立统一的经济地区。这个纲领主要代表市民阶级的利益，只有一部分农民知道这个纲领。但是如果这个纲领真的实现了的话，那就必然使封建的德国提前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

尽管参加起义的各派有着不同的纲领，但他们都汇合在宗教改革的旗号下，在空前规模的农民战争中震撼着德国的封建制度。起义军揭竿而起，一呼百应；他们攻破城堡，焚毁教堂，没收统治阶级的财产，给贵族和僧侣以沉重的打击。在德国中世纪末期的档案中保存着一个地方官吏汉斯·蔡以斯写给萨克森选候的报告，我们从这份宝贵的原始资料中可以看到当时农民运动浩大的声势和统治者们的惊惶失措。这位官吏在报告中写道：“殿下：从我上次给您上书以后，这一个星期内，此地的形势比以前更加恶化了。哈耳次山的三十几个修道院全部被暴徒们洗劫了、蹂躏了。座落在这一地带的……以及邻近的领地与采邑里的修道院，一概荡然无存。”“治下乡村里的老百姓，约一千五百人，昨天一齐都反了。他们成群结伙地朝着弗兰肯豪森前进，宣誓要作同样的事情。人越来越多，据确实消息，现已有六千人盘聚在那里。他们和繆尔豪森的一大群农民也发生了联系。风闻不定哪一刻就会围攻赫尔德隆根要塞。繆尔豪森的群众大约不止一万五千人。他们在阿以西斯费尔德来回骚动了整个一个星期，有些贵族们的府第被焚毁破坏，凡是能拿到的东西也都被抢光。史瓦次堡和埃尔恩斯德·芬·霍亨斯太因二位伯爵都被裹胁入伙。传说史托尔柏尔格伯爵也曾被迫宣誓取消一切苛律，依傍他们，虔奉福音，放弃所有的姜荣，只许以兄弟相称。”“他们狂奔聚集，日甚一日”，“几乎全体出动了。只有老迈龙钟的才留在家里。”“他们既然如此目无官府，我虽然居心和他们相安，也还是花好多钱也雇不到一个守寨的人。过去一个星期的情形，十分恶劣。但愿上帝慈悲，使它好转罢！”最后，这位可怜的官吏惊呼道：农民起义“势已如火燎原”！⑦

为了对付如火如荼的农民革命，南德意志的贵族们聚集在所谓“土瓦本联盟”的周围，组成了一个诸侯、骑士和许多帝国城市统治者的反革命集团，以斯图加特为中心。这个联盟招集了一支雇佣兵部队，由刽子手特鲁赫泽斯·冯·瓦尔德堡率领。狡猾毒辣的特鲁赫泽斯得到了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全力支持，他以欺骗的手段和分化瓦解、各

个击破的战术，利用市民阶级的背叛和农民的革命局限性，残酷地镇压了土瓦本和弗兰克尼亚地区的农民起义。同样，北德意志的农民起义也在黑森伯爵菲利浦和萨克森公爵的镇压下夭折，托马斯·闵采尔受伤被俘后英勇牺牲了。“德国人民进行的最伟大的革命尝试，以忍辱失败告终了，而且暂时还使压迫倍增。”可是，在这场德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中，德意志民族以其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和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证明了他们是无愧于欧洲历史上那个伟大时代的伟大民族。

二、无产阶级的萌芽的代表人物——闵采尔

对这个从十五世纪下半叶开始的伟大时代，恩格斯满怀革命激情地赞颂道：“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这些在革命时势中造就的英雄的共同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兼用。”⑧“农民战争中最伟大的形象”托马斯·闵采尔就是一位笔剑并用地向整个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封建制度，向一切旧的思想体系挑战的巨人。在托马斯·闵采尔身上和他的纲领中，民族的伟大目标和人民群众的具体物质利益结合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了。至于他所发动和领导的革命不得不披上宗教的外衣，这却是当时具体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托马斯·闵采尔约在1498年生于德国哈茨地方的施托尔堡。相传他的父亲死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断头台上。闵采尔自幼就继承了长辈的叛逆性格，早在十五岁时就组织秘密团体反对大主教。他聪敏过人，由于“他对当时神学的渊博知识使他早就得了博士学位”，后来被任命为一名牧师，他利用这个合法的位置高高地举起了人民宗教改革的大旗，最终成为一位平民革命家和德国农民战争的伟大领袖。在宗教改革的洪流中，他很快就和市民改良派代表、神学教授马丁·路德分道扬镳了——后者鼓吹温和的改良，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革命，在农民战争的风暴中堕落为可耻的叛徒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奴仆与帮凶。闵采尔在阿尔斯特德的说教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诸侯和贵族就是盘剥偷盗的祸首；他们把一切造物，水中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植物，通通攫归私有。然后他们却在穷人中传布上帝的训诫：勿盗窃呀！可是他们自己对这禁令却绝不遵守。因此，他们压迫所有的老百姓，抢劫穷苦的农民、工匠，掠夺整个世界。如果有任何人从他们那里拿去一点小东西，他们就把他送上绞刑架，而说谎博士（指路德）就对这一切祈祷一声：阿门！”接着，他愤慨地大声疾呼道：“老爷们自己有罪过，所以穷人变为他们的仇敌。他们既不愿消除（使穷人）愤怒的原因，又怎么能够指望长久的安宁和幸福呢？呵！亲爱的君主们，要是我主能拿着铁杖把这些旧壶破缸横扫一通，该是多么好啊！我说了这些话，会有人说我是大逆不道。是就是吧！”⑨他巧妙地利用圣训向劳苦大众发出了摧毁旧宗教的精神独裁的号召：“你们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偶像，因为你归耶和华中上帝为圣洁的民。”（《申命记》第7章6节）闵采尔用他“革命的宗教观点”创立了人民的新教，并联合了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秘密宗教组

织“再洗礼派”成立了他自己的党，广为宣传他的新教义，鼓动武装起义。他周游各地，到处播下革命的火种。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爆发后，闵采尔亲自领导了图林根地区的农民军和繆尔豪森市的革命政权，被公认为整个运动的领袖。起义失败后，闵采尔头部负伤被俘，他在诸侯面前被严刑拷问，然后斩首。他以生平的大无畏精神从容就义。他被害时至多不过二十八岁。

闵采尔是走在时代前面的人。在起义中，他这一派起草的《书简》是最革命的农民纲领。“正如闵采尔的宗教哲学接近无神论一样，他的政治纲领也接近共产主义。”因为，“闵采尔的纲领，与其说是当时平民要求的总汇，不如说是对当时平民中刚刚开始发展的无产阶级因素的解放条件的天才预见。这个纲领要求立即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早经预言的千载太平之国”，而“闵采尔所了解的天国不是别的，只不过是没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高高在上和社会成员作对的国家政权的一种社会而已。”不过，“他的理想是他本人才开始隐隐约约想到的；为要实现他的理想，不仅当时的运动，连他所在的整个世纪也都不够成熟。他所代表的阶级刚在形成中，距离发展齐全而力能推翻并改造整个社会之境还很遥远。他所幻想的社会变革，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中过于缺乏基础，甚至这些物质条件正在准备着的一种社会制度和他所梦想的社会制度是刚刚相反的。”因此，“他是被迫而不代表自己的党，自己的阶级，却去代表当时运动使其统治条件已成熟的那一阶级。他不得不为运动本身的利益而保护异己阶级的利益，他不得不以一些空话、诺言来应付自己的阶级，硬说那个异己阶级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任何人陷入这样的苦境，都是无可救药，注定要失败的。”不过，这并不是闵采尔的错误。历史的发展自有其客观规律。尽管恩格斯高瞻远瞩地指出闵采尔的理想在十六世纪初叶的德国不可能实现，但他却非常佩服闵采尔的革命思想和实践，给予极高的评价，并“向经常在自己的集会上纪念各国伟大民主主义者的宪章派建议，大家应向托马斯·闵采尔致敬。”^⑩

托马斯·闵采尔以他短暂的一生的革命实践证明，他确实是无愧于那个伟大时代的伟大人物，是德意志民族的杰出代表。但这“并不是因为他的个人特点使伟大的历史事变具有个别的外貌，而是因为他们具备的特点，使他自己最能为当时在一般和特殊的原因影响下所发生的伟大社会需要服务。”^⑪闵采尔站在比他同时代的英雄们都高得多的位置，他是“当时处于现存一切正式社会关系之外的那一阶级的代表人物，也就是无产阶级的萌芽的代表人物。”这大约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一个中世纪末期的英雄人物所能给予的最高评价了。

三、政治和历史的统一

如果说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是由无产阶级的萌芽的代表人物参加并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的话，那么在它失败三百多年后，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在德意志已趋于成熟。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欧洲革命中心移至德国，特别是在1846—1847年间，已十分明显了。这些年代是以一切现存的社会矛盾进一步尖锐化而形成严重的革命形势为标志的，这个革命终于在1848年爆发了。

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恩格斯敏锐地看到了十六世纪初叶波澜壮阔的德国农民战争和1848年革命的有机联系，他根据民主主义历史学家威廉·齐美尔曼的《德国农民战争史》所提供的史料，用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和1848年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了发人深省的对比，于1850年夏天写成了《德国农民战争》这部伟大的历史著作，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研究农民战争史的光辉典范。

在这部著作里，恩格斯第一次把他和马克思共同发现的社会发展规律，应用于分析以往的一个具体历史时期。他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和党性原则，为自己的时代总结经验教训，强调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经济基础的变化和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拂去岁月的灰尘和澄清敌人的污蔑而使历史上德国人民的反抗精神和革命传统大放异彩，并用火一样的热情在1848年的革命沉下去之后呼唤着新的风暴。他通过对农民战争史的研究阐明了一些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诸如无产阶级的同盟政策要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民族问题究竟含有什么社会内容等等。因此，恩格斯对德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真正地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生动地反映了政治和历史的统一，迄今在那些传播得最广泛的马列主义文献中一直占有牢固的地位。

四、恩格斯怎样研究农民战争

恩格斯是怎样研究德国农民战争的呢？

首先，恩格斯对十六世纪初叶德国的经济发展进行了综合的考察。他指出，从十四、十五世纪以来，德国的经济已有了显著的高涨。“城市行会手工业代替了比较封建的地方性的农村手工业，并为较广大的地区，甚至为较远的市场生产了。”工业“原料的开采同样也相当发达。德国矿工在十五世纪已是世界上最熟练的矿工。”科学技术上也有了一系列的发现和发明，“所有这些发明，都大大促进了当时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以相同的步伐随着工业前进。汉撒同盟^②垄断了海上航路一百年之久，遂使整个德国北部脱离了中世纪的野蛮状态。”“城市的繁荣也把农业从中世纪的简陋状态中解脱出来了。”……就这样，恩格斯用了不多的篇幅就给我们勾画出了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经济面貌。德国的情况也是整个欧洲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缩影，这决定了十六世纪初叶在德国以宗教改革发端的农民战争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然而，仅仅只有这样的分析是不够的，这不足以解释德国农民战争的特殊性。“马克思的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③我们在具体考察某次革命的特殊性的时候，就必须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发生革命的这个国家不同于其它各国的具体特点。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应用辩证法研究历史的典范。他指出，尽管德国经济在十四、十五世纪中有巨大的高涨，但是由于“纯粹封建帝国的解体”，帝国分裂成几百个独立的邦，“没有一个城市象英国的伦敦一样发展成为全国工商业的中心”，因此德国的经济发展和欧洲其它国家相比之下就不能不落后了。情况正如恩格斯所描绘的那样：“农业远远落在英国和尼德兰之后，工业远远落在意大利、

佛来米和英国之后，而在海外贸易中，英国人，尤其是荷兰人却已经开始排挤德国人。人口依然还很稀少。在德国境内，只是在几个工商业中心及其附近地区才有文明可言”，而这几个分散的中心之间也很少联系和共同之点。“国内外交通几乎只限于沿海和内河航路，以及……几条通商大道。远离这些内河和通商大道有若干较小城市，这些城市与大量的贸易往来无缘，继续停滞在中世纪末期的生活条件下而与世隔绝，只需要很少的外来商品，也只输出很少的产品。在农村居民中，只有贵族才能与外界接触，才有新的欲望；农民群众从来不曾超出最邻近的地方关系以及与此相应的地方眼界的范围。”在这样的情况下，使德意志统一为一个民族国家没有任何可能，而如前所述的工商业的缓慢成长只是更进一步的促成政治上的分崩离析状态，巩固和加强了封建诸侯的分裂割据。经济上的落后造成了社会发展的迟缓——“当德国人进行农民战争的时候，英国人，法国人，捷克人，匈牙利人都已进行过他们的农民战争了”，而“德国的分裂割据状态之加甚与加强是农民战争的主要结果，同时也是农民战争失败的原因”。

接着，恩格斯对农民战争前德国社会的阶级状况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他指出，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原因，“从中世纪保留下来的各阶级的状况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新阶级已在旧阶级之旁形成了”。十六世纪初叶德国社会的阶级结构是十分错综复杂的，然而在恩格斯的笔下却变得一清二楚，泾渭分明。不过，恩格斯并没有把阶级分析简单化，他实事求是地充分注意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各阶级的分化和变动，注意到各阶级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对新阶层的出现给予了深刻的评价。

“从高级贵族中出现了诸侯”，他们是分裂割据的封建统治者，掌握了德国最大部份的统治权。这是贵族中最反动的阶层，是农民革命的最凶恶的敌人；最后狡猾地分化和击溃起义军的就是这些人。他们是农民战争失败后“得到好处的唯一等级”。

“中级贵族几乎完全绝迹”，他们不是已经上升为独立的小诸侯，就是下降到低级贵族的行列中

“低级贵族，即骑士等级，迅速走向灭亡。”工业的进步使他们变成多余的阶层了。由于他们所处的特殊地位，使他们成为当时“最有民族意识的等级”。他们对帝国的没落不满，要求进行贵族式的“改革”，曾举行过以胡登和济金根为首的贵族起义，被诸侯的军队“轻而易举地制服”了。因此，在农民战争中，有一部份低级贵族参加了起义军，这就不不是什么值得奇怪的事了。

“僧侣是中世纪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的代表”，是农民革命的对象之一。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在僧侣中间有两个极其不同的阶级”，这就是僧侣中的贵族（教会显贵或僧侣诸侯）和平民集团（农村和城市的传教士）。后者“为运动贡献出理论家和思想家，其中许多人都代表平民和农民说话，为平民和农民的事业而上了断头台”。闵采尔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正如在诸侯和贵族之上有皇帝一样，在高级僧侣和低级僧侣之上也有教皇。”不过，由于分裂割据的诸侯与皇帝分庭抗礼，“皇帝的地位日益变成与诸侯相似的一个诸侯了”。罗马教皇则由于卑鄙无耻的横征暴敛而成为众矢之的，而使僧侣在农民战争中遭受了最大的打击。

城市的情况怎么样呢？随着工商业的兴盛，“市民中发展出三个截然不同的集团”。

“高踞在城市社会上层的是富贵家族，即所谓‘名门望族’”。他们是“城市贵族”，是城市中的豪强富户，是城市的统治者。

“市民反对派，就是我们今天的自由派的前身，它包括较富裕的市民和中等市民，以及一部分小市民。”这是个“温和派”、“合法的”、“有教养的”反对派，其中激进者只占少数。这个反对派“在十六世纪的运动中扮演着和他们的后代门徒——立宪派——在1848和1849年的运动中完全一样的角色，并且取得完全一样的成就”，他们是背叛革命的老手。

“平民反对派是由没落的市民和没有市民权的城市居民群众构成的。”这些没有市民权的群众包括手工业帮工、短工和游民无产者。“它把旧封建行会的没落成份和正在萌芽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尚未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成份结合起来了。”“他们是封建社会和行会市民社会解体的生动象征，同时又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最初的先驱者。”这是一个“复杂成分的混合物”，“农民的起义才把他们改造成党派”。在闵采尔和他的弟子直接影响的地方，他们才被卷入整个风暴中，“以致其中萌芽的无产阶级成分在运动中比其它一切都暂居上风”，这是“整个农民战争的顶点”。然而，在当时的社会关系里，他们这一集团却少有巩固的立足之地。

“处于所有这些阶级（平民反对派除外）之下的，就是全民族中大多数被剥削群众——农民。压在农民头上的是整个的社会阶层：诸侯，官吏，贵族，僧侣，城市贵族和市民。”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并不是他们自己的产业，而是掌握在封建贵族、教会或城市贵族手中。“主人象处理财产一样任意处理农民的人身，任意处理农民的妻女。主人有初夜权。主人一时高兴，就可把农民投入监牢……主人可以任意把农民打死，或者把农民斩首。……”中世纪末期的德国农民，处于十分悲惨的境地。然而，在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以前，找不到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只有很多局部性的农民暴动。这不仅由于农民住地非常分散，要取得任何共同协议都困难无比，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面对着诸侯、贵族和城市有组织的力量。恩格斯指出：“此种情况一日不变，农民即无可能独立进行革命”，“农民只有与其他等级联盟才能有胜利的机会”。据维纳·洛赫《德国史》的记载：“在1500年，德意志的人口约为一千五百万，其中约有80—85%是农村人口。”^①农民阶级占这时期德意志民族的大多数，他们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他们应该是历史的主人。当宗教改革的洪流冲溃了封建统治阶级牢固的堤防，而农民终于在新阶级中找到自己的同盟军的时候，他们才第一次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在德意志大地上演出了一出威武雄壮的活剧——这就是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但这场战争的悲剧结局又充分显示了农民阶级的局限性。

上述的各阶级构成了十六世纪初叶德国社会“极其庞杂的人群”。当时德国的分割割据状态以及交通条件的恶劣和由此而造成的各地经济发展的极不平衡，都使得十六世纪初叶德国的阶级斗争呈现支离破碎的局面。德国社会这“极其庞杂的人群”只是在宗教改革时期才随着革命的、政治性的宗教思想的普遍传播才较大规模地归并和勉强集结成三大营垒：“即天主教派或反动派，路德式的市民改良派，革命派。”他们各自为着“十分明确的物质的阶级利益”而在宗教改革的旗号下进行着激烈的阶级斗争，最后由

于反动派的疯狂镇压和市民改良派的叛卖以及革命派自身的弱点而导致了德国农民战争的失败。

就这样，恩格斯卓越地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农民战争史，指出马丁·路德和托马斯·闵采尔等所扮演的角色实际上是某些阶级力量的代表，而过去一直被错误地解释为宗教斗争的事件也就恢复了它们的本来面目，“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⑮，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研究历史的“指导性的线索”。同时，恩格斯还指出了1848年革命中的各阶级和1525年革命中各阶级的有机联系，使阶级斗争理论这条“指导性的线索”贯穿于整个的历史进程，这就赋予德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以重大的现实意义。在《德国农民战争》全书中，尤其是在恩格斯为这本书所写的《第二版序言》和《第二版序言的补充》中，进一步地说明了农民作为无产阶级同盟军所起的作用，使我们更鲜明地感受到了时代的脉搏，对这部研究数百年前的农民战争的历史著作为什么会深受德国工人运动的热烈欢迎而一版再版，也就不难理解了。

另外，还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恩格斯并没有把1524—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看成是一个孤立的革命事件，他不仅探讨了农民战争和1848年德国革命的联系，而且上溯到1476年以后的一些地方性的农民暴动，即以“吹鼓手汉斯”、“鞋会”和“穷康拉德”等名义发动起来的农民起义。同时，他还专门用了一个章节来介绍了农民战争爆发前以乌尔利希·冯·胡登和弗兰茨·冯·济金根为首的贵族们发动的旨在“建立以君主为首的贵族民主制”的起义。通过这些史料的介绍和分析，使我们看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对随后爆发的、席卷了德国社会各阶层的宗教改革运动和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就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研究历史的范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历史学家这样全面地对某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进行了如此深入和周密的研究，从而揭示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这对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也是颇有启发的。

最后，我们必须指出，《德国农民战争》这部历史著作，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如何关心和参加当代重大学术问题讨论并应用于实际的典范。怎样评价德国的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几个世纪来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甚至哲学家黑格尔和诗人海涅也参加了论战。1848年革命爆发的前几年，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随着列奥波特·冯·兰克和弗里德里希·克利施托夫·施洛塞尔两个历史学派展开大论战而达到了高潮。一方面兰克的门徒企图把所有的事件都勉强写进一幅极端反动的普鲁士式的历史图画中，说什么这些事件的结果是人类“第二次违背上帝旨意的罪恶行为”；^⑯另一方面，以威廉·齐美尔曼为其最重要代表的施洛塞尔学派，却处处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理想辩护。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史学观察方法对这次论战进行了科学的总结。他有力地批驳了兰克及其门徒的反动历史观和种种荒谬的见解，主要根据齐美尔曼的《德国农民战争史》提供的史料写成了自己的《德国农民战争》，认为齐美尔曼的书“不失为一部最好的资料汇编”。不过，恩格斯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施洛塞尔学派的水平上，而是有了飞跃的发展。他在《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中指出，齐美尔曼的论述“缺乏内在联系”，“如果说他没有能把这个时代的宗教上政治上的Kontroverse（争论问题）作为当时阶级斗争的反

映表现出来，如果说他在这个阶级斗争中只看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兜恶者和善良者以及兜恶者的最后胜利，如果说它对于决定斗争的开端和结局的那些社会关系所持的见解都带有很大的缺点，那末，这一切正是这本书问世的那个时代特有的错误。”而恩格斯的论述，正如他自己所说：“打算只是大致地阐明斗争的历史进程，打算说明农民战争的起源，参加这一战争的各种党派的立场，这些党派企图借以弄清自己立场的那些政治的和宗教的理论，以及从当时这些阶级的社会生活历史条件中必然产生的斗争结局本身；这就是说，我是打算指明：当时德国的政治制度，反对这一制度的起义，以及当时那个时代的政治和宗教的理论，并不是当时德国农业、工业、水陆交通、商业和货币流通所达到的发展程度的原因，而是这种发展程度的结果。”^{①7}（着重点是本文笔者加的）

这段话十分重要。它不仅是恩格斯写作《德国农民战争》的总纲，也是我们研究一切农民战争史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的指南。在这里，恩格斯把自己研究历史的方法和意图说得是这样的透彻、明了，使我们对纷繁的历史现象一目了然，掌握了开启历史迷宫的钥匙。这才是真正的历史科学，它使有史以来人类最伟大的历史学家都相形见绌！正如徐迟同志在读了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后的感慨：“使人觉得（历史上的）一切都清清楚楚，没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丧心病狂的“四人帮”摧残破坏历史科学十余年，完全颠倒了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和理论。今天，重读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有助于我们肃清“四人帮”在史学战线上的流毒，有助于我们运用科学的唯物史观正确地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

五、发展无产阶级的历史科学

综上所述，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是研究农民战争史的光辉典范；在我们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的时候，这是一本必读之书。

应该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它只是给我们打开了真理的大门。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是我们研究农民战争史的典范而不是“样板”，是指南而不是“公式”。恩格斯本人也在不断发展自己的理论，在《德国农民战争》的《第二版序言》中他就把自己对德国农民战争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第二版序言的补充》中又进一步发挥了原书的观点。他指出：必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越来越多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词句的影响，而时时刻刻地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①8}恩格斯并不满足于自己在这本书中对德国农民战争史所作的研究，1884年12月31日他在给左尔格的信上写道：“我打算彻底修订我的‘农民战争’，农民战争将是整个德国历史的基础。”^{①9}为此，恩格斯重新搜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作了许多摘录和笔记，并进行了更为广泛和深入的研讨，写下了许多札记和草稿，准备着有朝一日写成一部更好、更完整的德国农民战争史。可是，由于马克思的去世，他毅然承担起马克思遗著的整理出版工作，加之日益繁重的革命活动，使他不得不放下重写德国农民战争史的念头。他中断了自

已心爱的历史研究来献身革命和为亡友服务。甚至已作了多年准备工作并已撰写了一部分的《爱尔兰史》也终于未能写完就与世长辞了。这对无产阶级的历史科学，无疑是十分令人遗憾的重大损失。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遗产——在他们生前所作的历史研究中，已使“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他们所建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②⑩}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无产阶级历史科学的创建人，他们光辉的历史著作将永远彪炳史册，指引着我们进行历史研究的道路。

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我们耽误了十多年的时间；但也从反面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的辩证法。当前，摆在广大史学工作者面前的迫切任务，就是要用历史唯物主义深入研究包括农民战争史在内的人类全部历史，以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的历史科学，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为此，重温革命导师的历史著作和有关历史研究的教导，使我们更明确地认识到一条经受了科学和历史实践反复检验过的真理，一条以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的正确途径，这就是恩格斯所指出的：历史上“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②⑪}这段话，也就是本文最后的结论。

1979.3.贵阳

注：

①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恩选集》第7卷，第384—483页。

②恩格斯：1884年12月31日致左尔格的信。

③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④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马恩选集》第3卷第445页。

⑤维纳·洛赫：《德国史》上册。三联书店76年版，第53页。

⑥同上，第101—1.2页。

⑦《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人民出版社64年版，第357—358页。

⑧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45—446页。

⑨译文据《世界中世纪史原始资料选辑》第161—161页和《德国农民战争》第47—48页综合。

⑩海因里希·洛姆科夫等：《恩格斯传》。三联书店75年版，第98页。

⑪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三联书店72年版，第38页。

⑫汉撒同盟。见《德国农民战争》中文版注释23。

⑬列宁：《论尤民乌斯的小册子》。《列宁选集》第2卷第857页。

⑭维纳·洛赫：《德国史》上册。三联书店76年版，第56页。

⑮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586—587页。

⑯约瑟夫·冯·格雷特：《欧洲和革命》。1821年斯图加特版，第75页。

- ⑪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87—295页。
- ⑫同上，《第二版序言的补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96—302页。
- ⑬恩格斯：1884年12月31日致左尔格的信。
- ⑭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
- ⑮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4—425页。